

江口遗址副站长周羿杨： 接力做好江口遗址“守城”工作

文化中国行



7月31日,《眉山市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办法》正式出台。这意味着继成都之后,四川又一城市把基本建设考古前置推进到土地储备考古前置。“先考古,后出让”,这不仅能缓解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,更意味着文化资源富集的眉山,将会为保护地下文物作出更多的尝试和努力。包括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周羿杨在内的工作站成员,是践行该政策的重要力量之一。

尽管发掘工作已告一段落,江口遗址工作站的成员们依旧忙碌着。目前最紧要的工作,就是将7万多件出水器物进行分类,进而挑出每个类别的典型器物,描述、绘图、撰写考古报告。明朝白银货币的流通、社会经济状况、军事制度、金饰研究……这7万多件器物,能为考古工作者提供多个角度,还原明末的社会。“材料非常丰富,想怎么做研究都行,只要敢想就敢做。”周羿杨说。

国内首次围堰考古 办法总比困难多

2015年,周羿杨从大学毕业,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(以下简称省考古院)工作。当时省考古院人手并不充足,只要田野调查有需要,无论是负责绘图还是负责库房管理的工作人员都要参与进来。负责管理库房的周羿杨,被安排在成昆铁路西昌段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。阴差阳错,因带队老师负伤休息,周羿杨得到机会来到江口遗址参与发掘。

没有遗迹,没有地层,更没有载人潜水艇和科考船,有的只是岷江浑浊的江水,日夜不停地冲刷着布满泥沙和鹅卵石的河道。陆地上的考古经验,在这里并不能发挥太多用处。经过数次专家论证会,才决定以围堰方式进行发掘。联合考古队在发掘区域外围围上一个大的围堰,在其中再围出一个小围堰,用导流渠将子围堰中的水排出,再用大型抽水机24小时不间断抽水。这是国内首次围堰考古。

“遇到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发掘,如果当天没法提取,就只能派人整宿驻守。所以跟陆地上的考古发掘相比,会



江口遗址出水的文物。江口遗址工作站供图



周羿杨在工作中。受访者供图

人物简介

周羿杨,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。曾获评“四川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”奖。后陆续参与天府国际机场调查、成昆铁路复线宋家坎遗址发掘、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等项目。其间曾任职考古类学术期刊《四川文物》编辑部编辑。

遗址介绍

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,地处岷江与锦江交汇处的河道内,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,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,是1646年张献忠与杨展交战的古代战场遗址。该遗址的发现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。曾获评为2017年度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有更多的突发情况,困难也很多,但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周羿杨说。

“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想必江口遗址工作站的成员们也一定是抱着这样的心态,才能熬过不知道江底是否有遗物的焦虑,最终证实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。他们在发掘过程中,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流程,用坐标系记录下7万多件出水文物的出水位置,以及它们的出水状态。

两代人的接力 做好江口遗址“守城”工作

其实,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的身份,周羿杨还在适应中。2023年8月,她开始主持江口遗址的部分工作。“以前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。”现在除了本职工作外,周羿杨还有不少行政事务需要处理。

但周羿杨不内耗,不焦虑。想不通的时候,就放空一下,然后再将出头绪来。“凡事都会有先后顺序。我能做的,就是尽可能在我的层面,解决能解决的问题。解决不了的,还有刘院。”周羿杨口中的刘院,就是省考古院副院长、江口遗址工作站站长刘志岩。

周羿杨说,团队压力最大的时候,是刘志岩带队刚到江口遗址展开发掘那会儿。

尽管四川多地都在传唱“石牛(龙)对石虎,金银万万五。谁人识得破,买尽成都府”的寻银诀,但沉银的地方究竟在哪里,谁也给不了准信。

江口遗址工作站平日的办公地点就在江口汉崖墓博物馆。站在博物馆二楼,就能看到一期发掘区。“那段时间,刘院常站在博物馆二楼,眉头紧锁地望着发掘区。”直到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水,工作站成员心里的石头才落地。

在刘志岩的带领下,江口遗址工作站的成员有了明确分工,以至周羿杨接手时,刘志岩已将团队的整体研究方向、引进什么样的人才、团队成员能有什么样的发展,“安排”得明明白白。“这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。包括我自己,也是在他的指引下逐渐成长起来的。”周羿杨说。

如今,这位已成长起来的工作站副站长,已对自己和团队的发展有了明确认识:“现在要做的,就是跳出我自身的局限,完善团队结构。我能做的,基本就是‘守城’工作,保证工作站正常运行,配合博物馆建设等。”

普通人也能参与 创造公众与江口的共同记忆

江口遗址是全国首个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志愿者参与考古发掘的遗址。这也是刘志岩提出的创新。江口遗址有着自己的独特性。因为没有遗迹,也不需要刮面,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发掘流程,对于普通人来说,也“挺容易上手”。所以,考古站把工作流程分解后,发现拍照、发掘、资料整理等,志愿者都能参与其中。

“当时每一个探方都有一个负责人,发掘组、摄影组、资料组都驻扎在下面。器物出水后,就记录位置、初步清理并拍照,然后资料组在现场记录完后,就回到工作站里录系统、打标签、装袋、入库。随后,我就在库房里进行进一步的清理,文保组开始拍照等后续工作。”周羿杨说。

如今,周羿杨并不太能记得每个志愿者的名字,但却对考古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数家珍。

来自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一名志愿者,负责现场采集和标签记录,虽然本科专业与考古并不相关,但后来却考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,毕业后就职于某文管所;有的志愿者参与发掘后,去了学校任教,为文博行业培养下一代人才;更有人学成后返回江口遗址工作站,成为正式一员。“这个影响是深远的,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大家参与这个遗址的考古工作后,投身到了这个行业中。”周羿杨说。

当时,每个批次志愿者,都能分到工作日记,用以记录每天的工作内容。“一些孩子会记录一些生活化的内容,写得很有文采。”这是公众与江口遗址之间的共同记忆。考古站的工作人员也试着将内容整理成册,作为公众考古的其中一个部分,珍藏起来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瑛蔓

如何锁定张献忠沉银之处?

对话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周羿杨

“献率劲兵十数万,金宝数千艘,顺流东下,将变姓名走楚作巨商。展逆于彭山江口,纵火焚其舟,展身先士卒,殪其前锋,风烈火猛,展登岸夹攻,枪铳弩矢齐发。士卒辄重丧失多,急走成都。”清杂史《蜀碧》记载了一段传奇的历史。张献忠沉银的传说,便流传于四川。

江口遗址工作站如何确认战役发生地?近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周羿杨,听她细说其中的巧妙。

记者: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近期的工作重点是什么?

周羿杨:目前,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岷江到府河的河段已全部发掘完毕,对遗

址分布已整体掌握。野外工作基本已结束,正在进行室内清理。后续大部分工作就是进行科学研究。

记者:在确定遗址范围的过程中,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突破?

周羿杨:在发掘中段,大家都很有疑惑,为什么器物几乎集中在岷江东岸?其实我们也曾在西岸进行试掘,确实没有器物出土。后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,发现岷江在这个河段,是从北往南流,东岸才会有流水切割,形成航道。水深才能行船,这里又是岷江与府河的交汇处,自古以来船航行到这里,就会由大船更换为小船,再往成都去。所以我们推测,应当是船行驶到这里,在靠岸更换

船的过程中,遭到了伏击而沉没。

记者:如何确定这里就是张献忠遭到伏击的地方?过去这么多年,器物是否会因为流水而挪动?

周羿杨:一共有三方面的原因。首先,我们做了等比例研究,等比例地缩小了河床的石子、银锭,做了一个水流冲击实验,证明确实不会有太大的位移,因此帮助我们确认了,这里就是第一战场。其次,考古现场有一个现象,就是同类型的东西,在同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富集。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把同类型的东西进行了分箱装,才会出现这个堆积现象。还有就是,江口崖墓的山体为红砂石,整个河床也是。红砂石质地较软,贵重金属掉下

去后,基本就会嵌在砂石里头,会有一些嵌痕。通过考古发掘,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嵌痕。所以可以肯定,这些文物就是在原位沉下去的,并没有较大的位移。其实,考古就跟刑侦案拼凑线索一个道理,去反推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记者:这些文物预计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整理完毕?

周羿杨:我们都在加班加点地做,但因为体量太大,所以还是按照一年一期的计划来实行。此外,遗址博物馆也在建设中。整个博物馆都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,才能呈现得更好。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推进这个事情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瑛蔓